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2015

串接的叙事

自由、秩序、知识



孔

串接的叙事

自由、秩序、知识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串接的叙事：自由、秩序、知识 / 汪丁丁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1

ISBN 978-7-108-03302-4

I. 串… II. 汪…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3385 号

责任编辑 薛松奎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17.5

字 数 237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自序

终于，我为这些小文章的“三联”结集找到了合适的标题。不论何时，其实我始终挂念着自由，或许这自由的观念逐渐有了乡土中国的味道。只要读了前面的三篇文章，读者便可觉察，我所说的自由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自由的落实，依赖于秩序。可是，人类理性至多只能发现局部的秩序。如果理性自身竟因此而变得狂妄起来，那就连这一点真相都会被遮蔽呢。所以，知识是与自由密切相关的另一主题，不能不讨论的。

为了叙述的简明，我将那些最初级的道理呈现在最前面，更冗长的叙述则放在后面。这样安排的结果，难免有重复叙述。我知道许多读者喜欢这样的安排，因为容易理解。叙述原本是围绕核心观念的盘旋，每一次重复都会更深入。

在人类理性已经发现了的那部分秩序里，“民主”是一项重要内容。与“公平”一样，“民主”尚未在中国文化里获得合适的表达。在已经发现了的秩序里，“市场”是另一项重要内容。与它共生的，是“政府”。也是在这里，我将讨论“法”、“公民”、“知识”、“教育”、“理性”、“生命”和“幸福”，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本观念，于是回到“自由”——我的叙述的出发点。再深入一层的叙述，是中国现实政治问题，是中国人的公共选择问题和中国人的精神诉求问题。

还应从另一端开始，即从“知识”开始叙述。这是另一本文集，在那里，从知识的基本问题，中途涉及“秩序”问题，我的叙述仍要返回“自由”问题。

目 录

自序 1

卷 一

关于中国人的自由

——从杜威谈自由主义开始谈 3

论政治家的品格 6

民族心理倾向与权力结构 9

平庸时代的智慧 12

两种秩序 17

民主观念的要素及其文化表达 20

偏激与宽容

——关于中国人的民主精神 28

宽容与秩序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有感 26

自由——简单的和复杂的 28

关于自由与公平的一些初步看法 31

再谈“脚踏实地的自由” 34

卷 二

谈幸福问题 39

再谈幸福问题 42

脑与幸福 45

健全的理性 48

经济利益，个人权利，自我与社会 51

以幽默克服偏激 64

什么是“精英意识”？ 67

精英与市场 70

生命、激情、理性

——评兰德《源泉》 79

身份与幻觉 88

关于身份与资源的游戏 89

卷 三

世界公民与天下主义 95

历史责任感其实是敬畏感 98

三维自我的寓意 101

男性与启蒙 104

情志的消失

——从两个人和两句话说起 107

人格与理性选择 110

权利与权力的共生演化

——为巴泽尔《国家理论》中译本序 118

三十年改革：一百年政治—经济—文化反思 126

知识与体验 131

制度、个性与传统 134

权利、权力、自由 137

卷 四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143

抓坏人与合作秩序的扩展 153

重要的都是具体的 161

自由、秩序、效率 164

走出“良法”与“恶法”之争 167

恶法非法 170

最坏的组合 173

集体的困境 176

假使寻不出路？ 179

白芳礼的双重悲剧 182

比情色更重要的 185

卷 五

百分之二的问题和百分之二十的问题 191

城堡现状 194

当教育普遍失败之后 197

愚蠢的教育管理者 200

恶的官僚主义与不恶的官僚主义 203

浅谈“真”与“美”之间的关系 206

学术的品味 209

傲慢与自卑 212

在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217

中国人的焦虑、不信任感与“柠檬原理” 220

中国社会变迁、中国问题与《财经》立场 225

卷 六

制度化及其代价 229

走出制度幻觉：超越私有制和公有制两分法 242

健康的制度与病态的制度 245

道德转型期的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读斯基德爾斯基《凱恩斯傳》隨感 248

市场要求什么？ 251

市场，效率，充分竞争 254

关于竞争的充分性及其要求 257

市场与社会的病理学

——《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自序 259

为什么市场可能选择市场参与者们都不喜欢的结果？ 262

社会复杂性的政策涵义 265

既得利益与公共选择 268

卷 一

关于中国人的自由 |

——从杜威谈自由主义开始谈

杜威对中国人的自由观念影响很大，首先因为他是美国自由观念的重要阐释者，其次因为他是胡适的老师。1935年，杜威再次撰文阐释自由，标题是“自由主义的前途”。这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任何自由主义如果不高度重视充分的文化自由，不把文化自由与真正的工业自由的关系看做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一种蜕化变质的和骗人的自由主义。”

在上世纪初叶，美国人习惯地混淆了两种自由传统，其一是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信仰自由传统，其二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企业传统。后者，杜威称之为“工业自由”——这一自由权利主要是由企业家享有的。远比企业家自由更根本的自由，是源自信仰自由的“文化自由”。杜威这样解释文化自由：“只有当人们有机会有效地分享文明的一切文化资源时，人们才能获得人类精神和个性的充分自由。”他继续发挥：“把自由看成是企业家的自由，而忽视广大的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所受到的严重束缚，那是荒谬的……任何经济事务都不是单纯地经济的，它对文化自由的存在与否产生深刻影响。”

梁漱溟曾赞扬杜威的教育哲学，说他懂得生命，说他所谈无非就是心性之学——只不过缺了“心体”。由上引杜威关于文化自由的想法，我认为梁先生的推测大抵不错。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在于“一任本心”，即“静以通天下所感”的本心，也即“明心见性”的本心。与杜威的实践哲学完全一致，“明”心，关键是“践行”，所以“致良知”。如此践行的结果，可以

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状态。

但是，与孔子的践行格外不同，杜威的践行，关键在于将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每一个人有效地分享文化资源的“机会”联系起来，从而导出西方社会的民主观念。机会的平等，或基本权利的平等，这是民主的第一涵义，不妨称为“实质民主”，或康德意义上的民主——每一个自由意志通过反思而达成的与任一其他的自由意志之间的等度自由的契约。实质民主的反思性可导致良知，故而，康德意义上的民主观念与儒家践行所蕴涵的良知之间，相去不会太远。就这一点而言，牟宗三试图融康德与孔子于一炉，直觉是正确的。

不过，只要我们试图分析“机会平等”的涵义，我们就必须进入与平等有关的“程序”——所谓“民主程序”的讨论。因为，当我们定义“机会”时，不可避免地，我们要探讨每一个人的机会与他的心性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时间特征在于，当一个人较之他人先获得某些机会时，他可以利用先发优势获取较之他人更多的机会。例如，某甲比某乙较早得知关于某股票未来走势的“利好”信息和随后的“利空”信息，从而可投机获利并将某乙陷入利好信息公开之后股票下跌的逆境之中。如此环环相扣，结果可以是某乙将投入股市的全部资本输给了某甲。类似地，人们分享文化资源的机会，初始时很小的不平等可以导致未来极大的不平等。

与西方人不同，孔子及其后的儒家传统，遵循了“达则兼济天下”和“穷则独善其身”。故而，废封建之后，虽然“中国”成了孤家寡人的中国，百姓争取文化资源的方式却始终停留于“科举”一途之内。

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做是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两项命题：（1）就“自由”而言，中西观念大同而小异，归根结底要求心性的自由发展；（2）就自由发展的“机会”而言，中西观念大相径庭，前者返归心性修养，后者外求民主社会。

民主社会的立宪原理，其实是关于机会平等的各项程序的制订过程，奈特称为“政治过程”——以自由对话为基础的反反复复商讨。为了有效地参与政治过程，各利益群体必须寻找具有历史的和道德的正当性的政治表

达，所以，各利益群体必须有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治代表。这些代表，就是所谓“政治家”或“政客”——我曾专文介绍过这两类政治代表之间的差异。

一切法律和政策，如奈特所言，只不过是政治过程的外化，即已经获得了外在形式的社会共识。奈特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内在的政治过程而非外在的法律与政策。也因此，他认为衡量一个政府是否独裁，不是看它颁布的法律与政策，而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压制或操纵内在的政治过程。事实上，我们中国的宪法在字面上已经非常美好，尽管美好的文字与可实现的承诺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我们考察那些能够落实每一个人的基本自由和实质民主的诸项程序及相应的权利时，我们发现，等价于“最低纲领”的，是对话的权利，也称为“表达的自由”。其实——各国历史都如此，当表达的自由被限定在特权群体之内时，特权群体内部便可以有政治过程及政治民主。随着权利的扩散，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可以有表达的自由，于是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可以参与政治过程并享有政治民主。

这里，唯一需要补充的是——这也是奈特的看法：一个社会的政治过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持续提升该社会的文明水平，取决于那些参与政治过程的社会成员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并愿意承担他们对社会整体发展应尽的义务。

论政治家的品格 |

政治是贵族的事情。在没有贵族的国家，政治蜕变为宣传。当政治蜕变为宣传的时候，只有政客而没有政治家。在日常语言里，我们喜欢用“高贵的”来修饰政治家，而用“肮脏的”来修饰政客。后者之所以不高贵，因为他们把政治当做交易。当政治成为交易的时候，交易双方各自牟取私利。

政治家以公众利益为目的，为达成目的，他们难免也卷入政治交易。可是由于以公众利益为目的，他们让交易隶属于政治。于是，在日常语言里，我们说政治家是有原则的而政客没有原则，我们还说政治家有信仰而政客无信仰。

古代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临终时，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他的朋友们以为他已失去知觉，便开始历数他的丰功伟业和高贵品质：例如，他曾在九个敌对国的领土上建立了胜利纪念碑；例如，他在如此长久的时期内保持了雅典的繁荣。他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英雄人物而感到悲痛。这时，在弥留之际，伯里克利听完这一切之后喊道：“你们忘记了我杰出的荣耀，尽说那些主要取决于命运的寻常功绩。你们没有提到，从未有一位公民因我而披丧服。”在这位民主政治家所追求的理想王国里，如康德所称，“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这是一种信仰，在如此长期的统治中，能够不为私利而牺牲哪怕一位公民的生命，确实可贵。

按照我的理解，贵族应当由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来界定而不应由出身和门第的渊源来界定，虽然贵族气质往往与一个人的出身和门第有关。近代以来，世道变幻莫测，门第兴衰无常，我们几乎不可能仅凭外在特征来

推测一个人是否具有贵族的精神气质。更常见的情形反而是，在许多蓬头垢面的囚徒中，我们被一张高贵的面孔所吸引，或者，甚至那面孔也被污泥浊水遮掩着，却遮掩不住那目光所传达的智慧、沧桑、悲悯、高贵。

根据多数作者的观察，贵族气质主要来自教养。这里，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一个人的教养，究竟是由先天因素决定的还是由后天因素决定的？

教养与现代社会里所谓“正规教育”有本质不同。正规教育至今仍只是传授知识的过程，虽然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努力推广一种新的教育观念，把正规教育视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能力”的过程。教养与传授知识几乎无关，如章太炎所论的“小学”，教养所涉及的，是洒扫进退待人待物的习惯。由幼时的教养，随着阅历与见识的积累而逐渐融为风度。不过在日常语言里，不同品味的人可能赞美不同品味的风度，从而被称为“有风度”的行为可能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格调。因此，我还是喜欢使用“精神气质”或“人格”这类已经由一些伟大的学者详细界定的语词。

一个人的幼年教养，通常定义为三岁至七岁，最晚可至十岁，在这段时间内的全部体验，意识的和身体的，构成了幼年教养的内容和性格的定式。人格心理学的当代研究表明，性格一旦定型，几乎终生不变。

在幼年教养所培育的各种性情当中，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最重要的两种人类情感——正义感和仁慈感，通常发生于三岁而定型于七岁，只要有语言能力和模仿能力。仔细辨认，我们不难注意到，我们自己幼年时期通过语言所习得的对各种行为的褒或贬的判断能力，以及相应而有的道德情感，其实仍基于我们对成年人使用这些语言的情境及行为的判断的模仿。

所以，休谟曾总结说，人类的全部知识的根源就在于从相似的原因推测相似的结果，所谓“类比”。休谟的这一看法，已经被两位以色列经济学家引入当代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在最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至今未被广泛注意的重要论文。

可是，在中国转型期社会里，由于家长们的教养不足，更由于幼儿园教师们的教养不足，我们的孩子们的幼年教养远不是完善的。例如，我们常常看到被父母和祖父母们宠坏了的孩子，他们的行为特征是，要么过于